



东方学研究室

认识
“东
方
学”

APPROACHING
THE EAST

曾琼 曾庆盈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东方学研究工作室

认识
“东
方学”

APPROACHING
THE EAST

曾 琼 曾庆盈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识“东方学”/曾琼,曾庆盈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7-301-24142-4

I. ①认… II. ①曾…②曾… III. ①东方学—研究 IV. ①K1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4676 号



书 名: 认识“东方学”

著作责任者: 曾琼, 曾庆盈 编

责任编辑: 朱丽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142-4/H·351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1.75 印张 300 千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学研究室
“东方学研究方法论”项目由美国“赠与亚洲”支持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东方学研究方法论”项目组成员

- 指导教师：**刘曙雄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颜海英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研究人员：**林丰氏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何 晋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翁家慧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曾 琼 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曾庆盈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
 张 幸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戴 鑫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刘英军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刘 舒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王 欢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绪论^①

刘曙雄

“东方学研究方法论”(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Eastern Studies)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从2012年4月至2013年5月为第一阶段,从2013年6月至2014年10月为第二阶段。此项目在第一阶段所进行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 东方学方法论通论的研究,从宏观上研究东方学这一学科在方法论上具有的特点,以及东方学研究方法的演变和发展。2. 东方学专题研究,研究对象为东方学研究中某一具体领域中研究方法的独特性与普适性,以及在某些领域新出现的方法论所具有的特征。3. 治学方法研究,对国内外东方学研究者的治学和研究经验进行学理性的思考,发现其独到之处,并探究其在相关研究中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在项目延续的第二阶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辨析四种重要的东方学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方法、诠释学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和跨文化研究方法。诚然,如同时间和空间离开了物质不能独立存在一样,方法论也不能离开研究对象而独立存在,方法论应始终与研究对象融为一体。

为什么要选择研究这个项目?我一直认为,凡行事,方法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事有关东方语种的教学和研究,整体而言,无论是我身处的北京大学的这一学科,还是在我国的东方学研究领域,中国学者都做出了很多成绩,翻译介绍东方各国文学,研究东方各国的文化,包括古代文明和现当代的历史和文化。那么是否应该寻找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呢?答案是肯定的。方法论的研究不同于学科史的研究,虽然方法论研究与学科史研究有关联,但又不一样。学科史研究的对象是处在一定时空中的事

^① 本文的主要内容为作者于2012年8月在西安外国语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非通用语种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上所做的讲座“从‘想象的东方’到‘现实的东方’——东方学研究方法论略议”。其中对东方学研究方法论的解析是项目组共同探讨的认识,对实证研究方法、诠释学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和跨文化研究方法的表述分别源自何晋、颜海英、翁家慧和曾琼的发言。

物,注重事物存在的客观性。方法论研究的是如何认识事物,站在什么基点上,从什么视角,以什么手段和方法去认识事物。此外,我们中国学者研究东方,其他东方国家的学者研究东方,还有西方学者研究东方,他们可能站在同样的基点上、从同样的视角、以同样的手段和方法研究东方吗?显然不可能完全一致。这种“不可能”就激起我们很大的兴趣。方法论的问题不仅仅是个体进行科研时要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东方研究学科需要从认识上深化的关键问题之一。

一、东方学的定义和特点

东方学产生于东西方文化接触的历史之中。16—18世纪,当时对东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学者,甚至殖民者本身所从事的有关东方的研究,主要是为西方向东方的殖民扩张服务。早期的东方学是从学习和掌握东方民族的语言开始,主要方法是收集古代东方的手抄本及其他历史文献资料,再钻研古代东方的语言,对其进行翻译和研究。经过较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亚述学、埃及学等以历史研究为主旨的衍生学科逐渐在东方一些地区如西亚北非地区产生。又如印度,西方一些国家的殖民者自16世纪下半叶陆续前往那里进行商贸活动。英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逐步扩大对印度的渗透和占领,成为最强势的殖民者。他们在获取丰厚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印度悠久的历史文化。如同在西亚地区一样,西方对印度的研究也是从翻译历史文献开始的,18世纪末,英国学者在印度展开了学习印度语言和翻译历史文献的活动,以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化为主旨的印度学逐渐形成。殖民者需要了解 and 熟悉印度的历史、文化和现状,需要掌握在当地通行的语言,而这种语言便是乌尔都语或称印度斯坦尼语。于是,东印度公司首先决定向自己的职员教授波斯语和乌尔都语。经印度总督批准后,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创办了全印度第一所旨在培训英国人掌握印度语言、历史和文化的威廉堡学院。该学院1800年正式成立,有近百名教职员。学院分教学和编译两大部分,设有图书馆、印刷馆,开设语言和其他人文学科课程共20余门。印度斯坦尼语系主任由英国学者吉尔克里斯特博士担任。吉尔克里斯特于1782年应聘于东印度公司,任职期间专修了印度语言,周游了印度全境,利用各种机会学习和研究印度语言,1786年编写了《印度斯坦尼语词典》,1796年编写了《印度斯坦尼语语法》,1799年在公司的支持下在加尔各答开办了东方研习班,

威廉堡学院便是在东方研习班的基础上创办的。

伴随着学术机构和文化团体的建立、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到19世纪,学术意义上的“东方学”建立起来了。因此,可以说东方学是西方人开拓的,是一门西方了解和认识东方的学问。然而,西方学者开创东方学的意义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进行的东方学研究的意义。在西方开始关注东方时,西方学术界兴起了人类学学科,开始进行对人类社会文明的研究。在西方学者眼里,西方已经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而东方则处于一种未开化的文明社会状态,类似一种半文明、半野蛮的社会。这就是西方对东方的感受和想象。

东方学在上述地区的产生和建立具有一些特点:1. 由西方学者主导,为殖民政策服务。东方学历来使用的名称为 orientalism 或 oriental studies, oriental 是一个带有轻视甚至蔑视东方意义的词语,因此 oriental studies 是一个带有殖民文化印记的表述。我们现在选取方位词 eastern 取代 oriental,意在抹去这个印记。2. 以历史文化研究为主要内容,属人文学科。研究之初的手段便是发掘、收集、整理和翻译历史文献资料。3. 研究的基本方法有经验与实证,解读与诠释,分析与比较;以这些方法开展历史文化研究,而这类历史文化研究往往是跨越民族、种族和国别的。因此,跨文化研究自然而然地也成为了一种方法。

如同人类自身的产生和发展一样,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也并不是以从一个点向周边发散的形式进行的。无论是在西亚北非地区东方学产生和发展的特点,还是在南亚印度学产生和发展的特点,都只是东方某一部分地区或国家的情形。在东方其他地区,东方学产生和发展的时间和方式是不尽相同的。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东方学的含义是单一的,即开展与东方文明相关的各个领域的研究,是对知识的发掘、叙述和书写。当20世纪90年代后殖民文化理论兴起后,我们读到了阿拉伯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这部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作之一。萨义德在书中使用的“东方学”有三种含义:第一种是学术研究学科,第二种是思维方式,第三种是话语方式。第一种是基本含义,第二种和第三种是引申意义。从作者在《东方学》里阐述的“东方学”与政治不可分割的关联的角度看,此书翻译为《东方主义》似更为贴切,作者强调东方是西方的想象,强调话语与权力的关联。《东方学》从内容上分三部分:1. 从哲学和政治的角度勾勒东方学的轮廓;2. 描述重要的诗人、艺术家和学者的著作中表现的写作策略和手

段;3. 西方在对东方大规模殖民时期的有关东方的研究。萨义德的书在世界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东方和西方都受到批评甚至指责。西方学术界认为他背弃西方,站在与西方对立的立场上批评西方;东方也有学者认为萨义德还保留了西方对东方的表达方式和话语传统。我认为《东方学》一书中有两个观点值得重视。第一,他把西方东方学中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归于意识形态之列。应该说,方法论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方法论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比如实证的方法,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这一方法的理解和采用在东西方都基本一致了,不仅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包括在人文科学里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政治纷争和意识形态并没有成为交流的阻隔。这就是说,研究方法及其哲学层次的思考——方法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否则东西方之间的学术交流便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第二,他指出“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这一点对我们很有启发,他的观点暗示了东方话语方式的存在。如果要进一步解释的话,就是他的观点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在东方学或东方研究里潜在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究竟是什么?前面我们说过了,我们不可能和西方的学者采用同样的话语方式研究东方,尤其是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因为话语方式是一种权力,东方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总体上说没有话语权或少有话语权。在后殖民时期,东方各民族赢得独立后,东方国家开启了现代化历史进程。面对丰富而又庞杂的东方学科的知识,探究、找寻东方的话语方式或者说话语体系正是“东方学研究方法论”这一课题的目的。

二、构建中国的东方学话语体系

我国的东方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促使中国东方学建立和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以中国的印度学研究为例,它也具有从翻译开始的特点。中国古代翻译了大量的印度佛经,与此同时也翻译了一些印度的文学作品,当然,一些印度的故事最初不是作为纯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的,而是作为宗教传播的内容介绍的,并非一种纯学术活动。具有学术研究意义的中国印度学始自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最早对印度文学进行研究的是胡适,他于20世纪20年代就写有考证孙悟空的论文,提出其原型出自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的神猴哈努曼。胡适之后有许地山,他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和研究印度宗教和

哲学,回国后受聘于燕京大学,任教授,他撰写的《印度文学》是我国第一部介绍和研究印度梵语文学的专著。

北京大学的东方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并拥有一支学术研究的团队,始于1946年东方语文学系的建立,迄今已有近70年的历史。大半个世纪以来,北京大学的东方语文学系虽曾几易其名,结构也有调整,但其宗旨并无改变,即开展东方语言、文学和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建立和建设中国的东方学学科,以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自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队伍日益壮大,增设多种语言,拓宽教学和研究范围,各方面都得到长足的发展。近10余年来,北大东方学学科建设得到极大的发展。教学研究硕果累累、人才辈出,成为国内东方研究之重要团队。在北大,对东方古代文明的研究,对现当代东方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同时分布在历史学、哲学和外国语言文学等学科。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得知当代的东方学具有三种不同的含义,这三种含义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的意思指东方学是一门综合、庞杂的学科,它涉及关于东方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等多学科的研究,是一种以东方文明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知识。20世纪80年以前的东方学具有的含义基本上是这个单一的体系,这个体系以知识为主要特征,属于认知的客体,即研究的对象。第二层意思指东方学是与后殖民理论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话语体系,始自上世纪90年代。后殖民文化理论在中国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文化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等以及对这些理论纷纭众说的阐释都使我们开始认识到,世界已是一个越来越多元化的世界,西方中心主义已经不能独行其道,经过抽象化的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体系问世了。这个话语体系不是认知的客体,而是认知的手段和方法,属于认知的主体范畴,即研究者所思考的内容和采取的策略。

我国的东方学研究有别于西方人开拓的东方学研究,具有自身的特点,与西方的东方学、也与东方其他主要国家对东方的研究既存在着相同之处,也有相异的地方。就整个东方的话语体系而言,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 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东方主义(东方学的代名词),揭示的是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在东方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东方国家起主导作用的思想观念。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

应的现象,东方学主要产生在西方对东方殖民的环境下,而东方的话语体系主要产生在东方冲击和摆脱西方的殖民环境下。这是后殖民时期的主要特征,东方从被动变为主动,东方在作为叙事对象的同时也变为了叙事者。也就是说,在后殖民时期,东方学体现了自己对自己进行叙述的特征。

2. 东方主义成为一种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它既是西方思想传统的逻辑性继续,又跨出了沿着西方思想传统演进的轨道(原来的是一条以西方为中心的轨道,传递的是经西方思想过滤了的东方信息),为认识世界的多元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成为一种既分辨东西方思想、又使东西方思想紧密联系并开展对话的思维方式。

3. 一个庞大的东方具有差异,这是客观事实。季羨林先生曾经论述过世界的四个文化圈,东方有三个,即中国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这也说明,同为东方文化构成部分,它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它们之间的话语体系亦存在很大的差异。东方话语体系必定是经过整合这个差异才能形成,不像西方的话语体系,它涉及的国家 and 民族没有这么大的差异。东方话语体系以一种经过差异整合后的话语体系形态进入东西二元的世界文化之中的。

在发掘和表达东方这一话语体系时,我们尤其应注重中国学者对东方的研究,突出中国学者对自己国家和东方的了解、认知、诠释和表达。这不仅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更因为中国文化在东方文化和世界文化中具有独特地位。无论是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还是中国与其他东方国家的关系,抑或是就中国本身的状况而言,中国学者应有充分的自信,为建构属于中国的东方话语体系唤起自觉的意识和责任。这种责任源于三点认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中,在中西文化接触的早期阶段直到18世纪,中国文化对西方国家影响很大。16世纪末,利玛窦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后来天主教传教士金尼阁也将“五经”翻译成拉丁文。在以后的岁月里,《论语》《孟子》《诗经》和《书经》等都先后被译为拉丁文,一些经籍也有被译为法文和意大利文的。中国典籍传入欧洲,对西方的哲学产生了影响。这个时期,中国的绘画、瓷器、丝绸,乃至园林艺术也传入了欧洲。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影响了西方,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自然结果。基于这一认识,全球的东方学研究中以强调西方、忽视东方和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描述和诠释东方的思维定式应该得以改变。这是第一点认识。第二点认识是中国与其他东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不同,深刻认识在现代历史时期我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作用十分重要。为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华民族做出的惨烈牺牲是其他东方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过程中很少有的。这对于构建中国的东方话语体系无疑是重要的思想基础，并能赋予我们的认识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第三点认识是准确认识当代中国，当今中国在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一直坚持走一条独立自主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路途曲折，但中国始终锲而不舍，一直在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

三、研究方法与方法论

关于研究方法，我国东方学学者薛克翘曾应邀在项目组召开的研讨会上做过专题讲解。他归纳了三个基本的研究方法，即分析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较法——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综合法——由个别到整体，由特殊到一般，由初级到高级，由具体实证到理论总结。他指出，分析法的重点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在事物发展的动态过程中进行个案研究。比较法是通过比照分析，探究事物的本质特征，它既是方法论，又是本质论。如，近代语言学的兴起，就是东西方语言比较研究的结果。通过比较研究，既可以澄清一部分原本存疑的问题，还可以解决本学科之外的问题。综合研究是一个从个体到整体、从初级到高级的研究过程，它要求在整体的层面之上，经过研究者的思考和整合提出并解决问题。

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这些基本的研究方法通常是交互运用的，我们可以在赵国华和他的《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印证薛克翘归纳的基本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国华生前坚持十多年的思考、探索，用了两年的时间写作，完成了这部四十余万字的专著。对于这项研究成果的意义，季羨林在为该书作序时说道：“我在这里郑重推荐这部书，不仅向专门搞民俗学的学者们推荐，而是向从事研究古代历史、考古、语言、文学、哲学、宗教、美术、民族、人类学、神话学、古典文献等等的学者们推荐。”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苏秉琦读了赵国华围绕这个问题发表的论文后说，他的研究成果是一个系统的理论，据此可能要改写上古史。作者在该书前 6 章运用分析方法，第 7 章运用比较方法，最后以综合方法，从理论上归纳和升华。这项成果是交替运用研究方法并取得卓越成就的

范例。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推动了科学研究本身的变化。学科的交叉和研究方法及手段的交互运用成为一种常态,推动着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一些在社会科学领域运用的手段和方法也应用到了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东方学就其学科属性而言,属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但偏重于对东方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研究。其研究方法和手段自然也交互运用,但偏重于个体化的理解和诠释,个性化的感受和表达。

关于研究方法论,我们尝试着解释为支撑研究方法的理论。纵观我国东方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它们大多体现了对四种主要研究方法的认识和实践:实证研究方法论、诠释学研究方法论、比较研究方法论和跨文化研究方法论。

实证研究方法(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来源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它倡导研究必须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以经验为依据。十八九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多塞、圣西门、孔德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应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他们主张从经验入手,采用程序化及定量分析等手段,以期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也达到精准的水平。孔德针对社会科学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概念,认为社会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要历经神学、形而上以及实证等阶段。他的《实证哲学教程》一书的出版,揭开了实证主义运动的序幕,在西方哲学史上形成了实证主义思潮。

实证研究方法自产生以来,得到了哲学、数学和经济学领域研究成果的支持,在其他领域如管理学、医学也较为流行,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它又分为广义、狭义两种,广义的实证研究方法泛指所有经验型的研究方法,与理论知识相对应,它强调依据资料、观察或直接的感性经验;狭义的实证研究方法则是指利用统计和计量分析方法对数据信息进行数量分析。

实证研究重视研究中的第一手资料,研究“是什么”或“怎么样”。由于这一方法大量依据于材料,强调实践和经验,因此在运用中要注意避免伪实证和形式实证。伪实证,是研究者用理论预设或价值偏好来剪裁经验事实的作法,它不是“论从史出”,而是“史从论出”,也就是说研究者寻找一些经验与材料用来证实自己已经形成的理论预设,即先有观点再找证据,而不是先找证据再得出结论。形式实证是指研究者只有形式主义的调研,或者对搜集到的数据和资料缺乏甄别和处理,就直接应用于研

究。伪实证和形式实证都会使实证研究停留在肤浅的层次上。

我们在研究中使用这一方法时,一方面要扩展我们赖以研究的资料范围,尽量全面、系统地搜集某一研究课题的所有文献史料,并要对这些史料作严格的甄别和考证;另一方面还要扩展研究资料的种类,文献史料之外的考古遗址、图像资料等也要纳入其中。当然材料的堆砌不是我们的目的,现象的揭示也不是研究的终点,依托这一方法最终探究材料和现象背后的东西才是我们的追求。总体而言,即所有研究必须建立在材料的基础上,无论所研究对象是“实”(如战争、地理)还是“虚”(如思想、文化),通过材料本身或者对材料的诠释,探究其背后蕴藏的偶然与必然。

诠释学研究方法(Hermeneutics Research Methodology),“诠释”一词意为“了解”,由希腊神赫尔墨斯(Hermes)的名字得来。作为理解和解释的学科,诠释学有很长的历史,经历了圣经注释学、一般文学批评理论、人文学科普遍方法论这些阶段后,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哲学诠释学,从此开始诠释学对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代诠释学的意义在于:它将我们的人文学科从科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对科学方法论概念所设置的界限进行挑战,探索在哲学、历史、艺术等人文领域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人类精神财富。

诠释学又可以分为经典诠释(或文本诠释)与历史诠释两部分,前者以经典文学作品的解读为主,后者则以更多样的材料(文本、图像、考古资料等)研究历史问题和文化现象。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应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解读经典必须重新回答经典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作品的意义在于过去与现在的沟通,以及对未来的启示。理解不是重构的过程而是创造的过程。经典的永恒在于当代人的参与和从中揭示新的内容。二是展开灵活多元的比较,目的是寻求诠释的各种可能性,而不是止步于阶段性的结论。

比较研究方法(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广泛应用于科学研究领域。以比较文学为例,比较文学是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文学的比较研究,研究各种跨越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或变异性,以实证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文学变异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审美特征,加强世界各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比较文学的可比性由三个条件组成,即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或变异性。由此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三大领域:实证性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变异学研究。

比较研究方法之于“东方学研究方法论”这一课题的应用价值是探讨东方学的同源性研究、异质性与变异性研究。东方文明之间存在着很多值得做同源性研究的素材,但这种“求同”意识往往使东方的学者产生思维惰性,降低了主动发现“存异”现象的敏感度。而中国学者正是在对日本、朝鲜、越南等“汉文学”系统的研究时,发现了文学的变体,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和文化变异研究也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现其重要意义。

跨文化研究方法(Cross-cultural Research Methodology)兴起于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所形成的多元文化环境之中。传统的跨文化比较具有一种“中西对比”或“东西对比”的二元思维模式,在这种“中(东)西”二元论的模式中,“中西”或“东西”文化被看成两个相互隔离的异质实体,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常被简单化成一方向另一方,或一方对另一方的对抗。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不同文学文化间的交流对话也越来越频繁,为了防止不必要的“误读”与隔阂,就必需一种多元的文化对话理论。在当下,作为研究方法的“跨文化研究”,首先应当跳出单边文化的立场,要以包容他者文化的心态来确立自我与参照系之间的精神逻辑关联,建立一种三维乃至多维的思维模式,从文化整体交流、变化、发展的层面来思考以往的“中西”、“东西”文化交流,以及当前的文化交往现象。

跨文化研究方法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个方面是系统的文化比较研究层面。这个方面,通常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对象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从它们之间多重的交互关系来考察各种文化在这种关系中的地位、变化和发展。这个层面更多地偏向某个时期内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横向研究;第二个方面是以某一种文化为立足点和出发点,考察这一种文化在不同时期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这个方面更侧重于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以多元文化互动的视角来看待和研究某一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可以看作是一种纵向的研究。

探索、应用跨文化研究这一方法的目的在于,在文化交往和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入的今天,一方面思考什么样的民族的,可以成为世界的;另一方面,要超越民族的界限,超越中西的和东西方的界限,从多元文化交互作用的角度,思考自我文化的立场和全球化问题。

我们将支撑这四种基本研究方法的认识和理论归纳为东方学研究方法论。因此,“东方学研究方法论”是认识事物的一个基点,一种思维方式。它以对东方各国、各民族,包括中国文化、日本文化、印度文化、东南亚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非洲文化以及古代近东文明等领域的研究

中所获得的成果为依据,研究总结学者们在上述领域的知识性研究中所倚重、探索和创造的方法论以及所形成的话语体系,我们不仅对东方国家的学者所形成的体系进行思考和叩问,而且也对西方的东方学研究进行考察并以此为参照。

“东方学研究方法论”项目致力于探究、归纳和描述中国学者在东方学知识的研究中形成的话语体系,力图在梳理、研究、整合中国东方学研究者成果的基础上,发现中国学者独有的视角与方法,让中国学者能在国际东方学舞台上发出更多的声音,形成中国学者的话语体系。这就是“东方学研究方法论”项目之内涵。

目 录

绪 论 刘曙雄(1)

“东方学”理论探索与经验集萃

中国“东方学”:概念与方法 王向远(3)

阿拉伯伊斯兰与东方学 蔡伟良(20)

东方文学研究方法论刍议 孟昭毅(39)

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抑或交光互影

——东方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 刘 建(49)

学山问路

——东方学研究方法谈 薛克翘(59)

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法谈 刘家和(66)

汉学的往昔与今日:方法与目标 梅维恒(Victor H. Mair)(73)

当下性:“象牙塔”与大众之间

——我的治学路径与取向 林少华(86)

探寻“照世杯”中的中国镜像

——波斯历史文献整理的实践与收获 王一丹(99)

西方纸草学研究与方法 戴 鑫(114)

认识“东方学”专题研究

浅议简册制度中的“序连”

——以出土战国秦汉简为例 何 晋(133)

云冈石窟和北魏王权 曾庆盈(154)

“空间的文本 文本的空间”

——浅议日本文学中的“都市空间论” 翁家慧(179)